

青年與社會變遷

Youth and Social Change

R. Flacks 著
區紀勇譯



青年與社會變遷

區紀勇譯



511
G78
517

青年與社會變遷

Youth and Social change

Richard Flacks 著

區 紀 勇 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HS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

青年與社會變遷

Youth and Social change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1045 號

著者：Richard Flacks

譯者：區紀勇

發行人：熊嶺

印行者：巨流圖書公司

公司：臺北市木柵路一段(溝子口)242號

門市：中國書城內(臺北市成都路1號)

電話：(公司) 9315049 (門市) 3711031

郵購：郵政劃撥帳戶 100232號

中華民國 64 年 11 月 出版

特價臺幣：35元

文化之模式

Ruth Benedict 著
黃道琳譯

你對自己的文化做過反省嗎？你對異地的風俗感到迷惑嗎？這是一本你不能放過的人類學經典著作。作者潘乃德夫人是人類學權威，她利用大量的田野調查資料，兼採哲學、史學、心理學的理论，提出「文化模式」觀點，簡潔而深刻的勾勒出文化的基本形貌。譯者曾經譯過作者的另一名著「菊花與劍」，頗獲佳評。

告預書新

人類學家米德自傳

張恭啓譯

瑪格麗特·米德開創「文化與人格」的研究，著作等身，家喻戶曉。她以文化與青年適應，以及文化與兩性人格的探討成名。後交潘乃德研究日本文化（中譯本「菊花與劍」），她則研究蘇俄文化，晚年更研究婦女問題，種族偏見，教育危機，民主政治（如中譯本「蓬車與明星」），青年問題（如中譯本「代溝」）。是美國學術界的風雲人物，青年學生的導師。本書自述其多姿多采的一生，不僅有助於人類學的研究，更可認識這一位人類良知的偉大人格。



譯者簡介

區紀勇

民國廿八年生 廣東人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
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碩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

目 錄

譯序——這是一本怎樣子的書·····	一
第一章 導言·····	五
第二章 青年的概念·····	一五
——不同類型社會的觀點	
第三章 在困惑中成長的一代·····	二九
——父母的價值衝突及困惑——社會變遷的步調	
第四章 計劃變遷的一項意外結果·····	四九
——青年次文化的形成	
第五章 青年的反文化運動·····	六三

青年文化的功能——「知識份子」青年文化的

擴散——學生激進行動主義的興起

第六章 七十年代的一些可能動向……………一三三

新意識向非學生青年擴展——青年文化的「區

域化」——「受教育勞工」的偏激化——婦女

解放及兩性角色反叛——回到政治上去嗎——

為什麼要革命——青年團結的瓦解

謝言……………一八一

叢書導言……………一八四

譯序——這是一本怎樣子的書

一個社會有沒有前途和希望，青年是診斷的脈門。

青年人的意向及行爲，往往反映出這社會的病症；青年人自發的運動，往往代表着他們對社會的關切和允諾，代表着他們正要跟這社會的病菌搏鬥，代表着這社會將會朝向一個更健全更完美的歷史階段邁進。

這本小書所討論的，正是這一方面的問題——它毫不諱言地批判了近代社會的某些病態，它清晰地分析了在六十年代裏曾使美國文化動搖過的學生運動的含義。

六十年代以前，社會科學家們都認定美國社會是非常穩定的：美國人一般都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工作；理性、節儉、勤勞、冒險等企業家型的性格最被崇尚。六十年代前大學生們的性格是

那麼順從、滿足現實、不好談政治；他們追求財富、地位，他們都向成年人看齊。在那時代裏，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念、制度、科技等，在人們的眼裏都顯得這麼完美無缺，沒有人會意料到短期內會有什麼變亂的，更沒有人會想像到變動的原動力竟是那一大羣養尊處優的、前途美好的大學生。然而，到了六十年代，青年們反種族隔離、反歧視、反核試、反越戰，並且，一股新的次文化從青年羣中蘊釀出來，擴展開來，與既存文化對抗。青年羣中這種急劇的突變，否定了五十年代的社會科學家們對美國的構想，也震驚了整個美國文化。

這種出人意表的變化，自然引起很多人要尋求解釋。有些人把它歸因於什麼「青年精力過剩」「呀」、「道德崩潰」呀、「左派」呀、「代間衝突」呀……等，但這只表示了他們沒有真正了解問題的本質罷了。分析這一類問題的適當人選，應該合乎兩個條件：（一）他必須曾真正地作過青年——他必須曾以一類青年的心來對社會寄過厚望，必須曾以一個典型的（而非特權的）青年身份來體驗過社會上的種種善與惡，必須曾切身參與過青年們的運動。（二）他必須在分析社會現象的思想上方法上受過嚴格的訓練。具備了這兩項條件的分析者，才不致流於隔靴搔癢，理不清千頭萬緒的零散事件。

本書的作者，至少從他在本書的導言裏的自白看來，是合乎這兩項條件的。作者在大學時代

裏曾親歷過五十年代美國大學門牆裏的政治冷感氣氛，參加過支持民權法案的請願遊行以及反戰示威，並且作過不知多少次的運動演說，當過青年民主黨的主席，及民主社會學生會的全國執行委員。（在五十年代裏，有興致和勇氣對社會的不義批判的青年僅佔很小很小的部份。）另一方面，作者是一位社會學教授。由於作者具備着這樣深切的經歷和思想訓練，所以他能够把問題抓得緊、挖得深，而思路又一直保持着相當的嚴密性。

在本書裏，作者把科技發展看作一個自變數，高度的科技發展使美國從儲蓄型的經濟蛻變而成消費型的經濟，使企業型的社會組織為大型科層組織所取代。科技的發展更需要大量的高級專業人員，因此，高等教育機構使得在數量上拼命增加。科技發展帶來的很多後果，都向美國的傳統倫理挑戰：它們要求這社會的價值觀念及制度改變，傳統的節儉、禁慾、勤勞等美德在高度的科技發展下不僅已失去其意義，並且是有害於繁榮的；它們要求個人的性格也應隨着改變，社會對個人的評價，不再基於他如何節儉、如何創業了，而是基於他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及他在大型科層組織裏的職位；它們更要求年輕的一代趕快學得這一套觀念，要求各家庭及教育單位把下一代培養成能適應這個以消費、富足、互賴、策劃為基礎的社會。畢竟，觀念的發展是經常遠遠落在科技發展之後的。教會的牧師們、學校裏的教師們、社會中的政治家們，依舊宣揚着傳統

的倫理，而電視、報紙、雜誌等傳播媒介却天天鬧着消費和享樂。另一方面，在家庭單位裏，父母們都受着互相矛盾的新舊價值觀念及制度的壓力，無法把一套清晰的觀念及行為模範向下一代交代出來，於是，青少年們也就難以從家庭或學校裏找到一個可以認同的形象了，這種情況，給青年次文化的勃起建立了一個心理基礎，這種心理基礎迫使他們向同輩羣體認同，青年次文化也就慢慢地通過互動過程成長出來。另一方面，社會上的種種問題如種族歧視、失業、貧民、越戰……等等，迫使成長於自由開放氣氛中的美國青年，拿出學校授予他們的思考方法來對既存文化及制度批判，在成長中的青年次文化也就慢慢地走向與既存文化對立的道路上去。

上面這短短的描述，自然無法概括本書的豐富複雜的論證，它只能給讀者一個大概的輪廓罷了。當讀者細讀內文時，這模糊的輪廓便會漸漸明朗起來的。

譯者 民國六十四年九月於史丹福

第一章 導言

有關「青年」的書籍及文章，可謂無日無之。只要報章編輯、知識份子、社會科學家，及其他的人認為青年們的行為，有描述、分析、辯護、攻擊的必要，一般人也就有閱讀這類文章的必要了。我想，人們之所以這樣熱衷於對青年的行為尋求解釋，是由於青年們正以各種方式在攻擊並背棄美國的主要文化、政治、及社會的制度和原則；而這些行動竟又發生在物資豐盛、個人有充份發展機會的時日裏。許多美國人都了解反叛是什麼——特別是發生在其他地方，其他年代的反叛——但他們通常只把反叛解釋為對饑餓、暴政、及不平等的反應而已。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反叛行為竟發生於豐衣足食、經濟前途光明、生活奢華、有着太多自由的美國青年——尤其是白人中產階級的青年——之中；表面看來，這的確是不可理喻的，某些新的事故必在蘊釀着：一

個源流不明的運動正威脅着現有的生活方式；正因它是如此不可理喻，所以我們必須對它尋求解釋。

你也許不再想閱讀有關青年的書籍了，你也許與我有着同感：大多數有關青年的報導與解釋都是極不準確、極不完整的；也許你和我都相信，時下發生在青年羣中的各種問題已經够明顯、够深刻、够複雜了，它們已迫使我們必須不斷地釐清、修改、及推行我們的解釋。

在此，我不敢保證說，能提出任何較之您曾經閱讀、思考、或討論過，更加完美的概念和理論。我能作的僅是：對本書所擬探討的事物作一番評述，並且闡釋書中我所抱持的獨特見解。

就五十年代的大學生而言，我當時算是「逸出常軌」的人了。因為我屬於政治的積極參與者這類型。作爲一個大學門牆內的青年民主黨主席，我曾參加過支持民權法案的請願遊行，開過不少會議，散發過不少傳單。在我們校內上萬的學生中，約有五十人在政治上是很活躍的，這些人包括所有的青年民主黨黨員、青年共和黨黨員、青年社會主義黨黨員、美國青年民主行動黨黨員（譯者按：ADA，即 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學生會員（譯者按：NAAP，即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及學生中的政府活動參與者。每當我們遊說學生們爲民權請願簽名時，通常的反應

是：簽上了名或參加了某些團體對他將來謀求公職，可能形成障礙。總之，那是一個對政治普遍冷漠的時代；由於惟恐表示自己的觀點會引來麻煩所產生出來的政治冷感，這種態度瀰漫了整個五十年代，這種態度根植於對麥卡錫主義——在經濟蕭條的三十年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對那些被視為極端份子及改革份子列上黑名單，及採取冷酷偵緝行動——的恐懼。

我記得，在五十年代裏，學生們不僅普遍的對政治冷漠，更有甚者，崇尚「溫文儒雅」之風，幾乎像瘴氣疫癘般籠罩了他們的整個生活。所謂的「溫文儒雅」，就是表現得「像個學生」——短短的頭髮，東部名校的深灰色衣服，齊膝的短褲，及圓圓的別針。而在政治冷感和溫文儒雅底下，則瀰漫着一股每人都想「做到這樣」的氣氛——躲進一個安穩、與世無爭、相依為命的小鎮集般的世外桃源裏。

然而，我們當中有小部份人却是政治家和「知識份子」，這也就是說，就對事物的關心而言，我們是不同於流俗的。我們關心社會、關心藝術、關心書本、關心想，但我們却與一般人有着強烈的憤世嫉俗心理；在我們看來，將來的日子不會與五十年代有什麼分別，我們那時所能期望的僅是一種在心靈上較飽滿、較有趣味、較有原則的生活方式而已。對我及我大多數的朋友而言，學術生涯能使我們從事合乎自己志趣的工作，接觸合乎自己志趣的人物，與同道者交換意見

，並可免除鐘錶所強加於我們身上的枷鎖。因此，我決定念研究所，作一個社會科學家。

一九六〇年初，至少在我念研究所的安娜堡 (Ann Arbor) 那地方，校園內有了些新變化。主動表示支持南部民權運動的學生愈來愈多了，溫文儒雅及墨守成規的風氣已逐漸被那與日俱增，難以遏止的政治辯論取代了，由於對民謠、嚴謹的影片，以及其他文化活動有着共同的興趣而聚合在一起的學生也愈來愈多了，他們還嘗試着過奔放不羈 (bohemian) 的生活和穿輕鬆簡便的服裝。

一九六二年，我發現到安娜堡的一些學生開始嚴肅地策劃着一項全國性的基本社會變遷運動，他們正籌備着一個名叫「民主社會學生會」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的組織，同時正釐訂着嚴謹的計劃，以推動學生們參與民權運動、反核子試爆、及反軍備競賽。在我看來，民主社會學生會的產生正意味着時代的轉變——麥卡錫主義已死滅了，大學門牆內的冷漠及順從正遭受力行及反抗的新精神的挑戰。於是，我全心全意地加入了民主社會學生會，參與他們的全國性議會的奠基工作，稍後又被選為全國性的執行委員；從此，我便從一個厭世的「明哲保身者」一轉而成一個年青的「新激進份子」了。

自此之後，我一直都是個政治性運動的活躍份子——我擔任了幾年民主社會學生會的幹事，

其後又幹反戰的工作，也支持過學生的若干示威運動，並且作過不知多少次的演說。讀者在讀本書時，請勿忘記我曾是個學生運動的直接參與者；我的切身經驗，使我能夠獲得這運動的參與者及進行情況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是其他的研究者難以獲得的，但我的切身經驗却使我對青年的反叛產生偏見，使我認為青年的反叛是積極的，是在歷史上具有決定作用的（而非多餘的），同時，在社會上是必要的。

同樣，在這幾年中，我更變成了一個社會學家；換句話說，除了參與政黨外，我也參與了專業人員的圈子——以促進我對社會現象的了解，及將我的了解獻給別人。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勃起，刺激起我對社會現象的好奇和對人類的忠誠。譬如說，何以大學門牆內的氣氛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着這麼顯著的轉變？民主社會學生會又是何人所發起的？誰是那些放蕩與嚴肅巧妙地變化在一起的抒情詩人？何以那些豐衣足食的時代寵兒竟會把自己投進種族平等、反戰爭、及反兵役的漩渦裏？何以那些抒情詩人和行動家同時獲得愈來愈多的青年們的支持與信從？這些都是社會學所探討的核心問題，它們引發出社會學家們近年來才談論到的問題；事實上，以往社會學家們不僅不能預測出六十年代的羣衆運動，並且，他們的觀點還否定了這種運動會在一個如美國般「穩定」、「民主」、「多元」、「富足」的社會裏發生。